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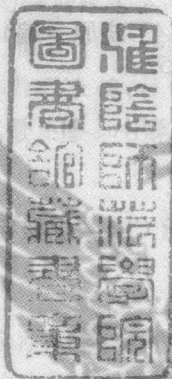


楚辞研究新思维

翟振业【著】

◆ 苏州大学出版社

虞山学术丛书



楚辞研究新思维

翟振业【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 584912

◆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研究新思维/翟振业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9

(虞山学术丛书/丁晓原主编)

ISBN 7-81090-152-4

I. 楚… II. 翟… III. 楚辞 — 文学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909 号

楚辞研究新思维

翟振业 著

责任编辑 王英志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 215021)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装

(地址: 常熟市元和路 98 号 邮编: 215500)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47.75(共八册) 字数 957 千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90-152-4/C · 5 定价: 128.00 元
(共八册)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7258802

《虞山文库》总序

许 震

虞山,以“十里青山半入城”的姿态与文化历史名城常熟融合,对常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影响巨大,并进而成为常熟的别名和常熟文化的标志。商末,周太王长子泰伯、次子仲雍让国避奔江南,建立“勾吴”,泰伯、仲雍相继成为首领。仲雍死后葬于常熟卧牛山,仲雍又名虞仲,山遂以虞为名。春秋时期的言偃生于常熟,北学中原,成为孔门七十二贤人中的“十哲之九”,晚年回归故土传道讲学,“道启东南”,“文开吴会”,死后葬于虞山东麓。仲雍和言偃,昭示了常熟文化源头的深邃和博大,标志着吴地早期文明曙光终于开启出一个区域文化的圣地。

常熟文化发展绵延不绝。南北朝昭明太子的“文选”,开始了常熟文化发展的自觉时代;自唐代陆器高中状元,常熟历史上出过8个状元483个进士;北宋时郑时性嗜书好藏书,开了明清时代常熟出版、藏书兴盛的先河,赵琦美与脉望馆、瞿氏与铁琴铜剑楼、毛晋与汲古阁都对中国文化史作出过重大贡献;元代的黄公望,以其绘画理论和创作开创了明清山水画的新纪元;明清之际以王翬为首的“虞山画派”、以钱谦益为代表的“虞山诗派”、严澂的琴学理论和虞山琴派,还有虞山书派、虞山印派等,都达到全国一流水平,影响一时风气;近代

以来,黄人的文学史论、曾朴的谴责小说等,表明常熟文化在求新变革时吐故纳新的活力。基于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常熟当代文明,更是显示了勃勃生机。

常熟高等专科学校就坐落在人文荟萃的虞山脚下,接受着常熟深厚博大的传统文化和生生不息的现代文明的滋养。学校在与地方经济和文化的互动发展中获得不竭的创造精神,塑造崭新的主体形象,确立自身的价值目标。学校有一批人文和理工学人,更是为常熟的传统文化甘泉所浸润,以虞山的人格精神塑造品行,用致远的人生追求敬业乐教。宋人朱熹在《丹阳公祠堂记》中说言偃为人,“必当敏于闻道而不滞于形器,岂所谓南方之学,得其精华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明末龚立本纂修《常熟县志》15卷,其中《风俗志》说常熟士人“贫不负诺,富不易交,吐纳风流,意气横溢。表人胜士,千里命驾者比比,人物显晦殊途,或矜名节,或树勋庸,或敦学术”,这都揭示了常熟传统文化中独特的人格精神。这种精神是常熟文化生生不息的产物和动力,也是常熟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的底蕴和财富。常熟高等专科学校的学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自觉地从立足的虞山福地的传统人格精神中汲取营养,坚持自强不息、敏捷好学、达美达诚的学风,在学术园地和育人园圃播种、耕耘和收获,形成了一批学术探索和教学研究成果,这是可喜可贺的。

常熟虞山,由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不断的文化传承,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创造的意象。正因为如此,我们愿意把这批初步的成果以“虞山文库”为名,汇集出版。我们无意创造学派,而意在宣示精神,表明当代学人对传承人文传统、创造现代文化使命的一种担当。我们衷心希望这项工作能够继续下去,能有更多的成果充实文库,承担起当代学人文化建设的重任。

2003年4月

目 录

前言：楚辞研究新思维概论	(1)
一 创楚辞学史 建里程碑业	
——王逸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18)
二 沅湘流不尽 屈子怨何深	
——朱熹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27)
三 离骚未尽灵均恨 志士千秋泪满裳	
——王夫之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36)
四 沅湘水滔滔 离骚梦悠悠	
——吴世尚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44)
五 云山万重 寸心屈骚	
——蒋骥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59)
六 融屈赋于经 渗朴学于骚	
——戴震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69)
七 考辨时地 踏遍三湘	
——胡文英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77)
八 绝顶少来者 高松鹤不群	
——梁启超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84)
九 居高声自远 非是藉秋风	
——王国维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92)

十	继往开来 独树新帜	
	——游国恩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101)
十一	推陈出新 探幽解疑	
	——闻一多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110)
十二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	
	——苏雪林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119)
十三	含英咀华 别开生面	
	——钱钟书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128)
十四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大宫真人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138)
十五	田野考察 蹊径独辟	
	——林河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151)
十六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萧兵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论	(159)
	参考文献	(170)
	后 记	(172)

前言：楚辞研究新思维概论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云：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
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
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公元前4世纪，继《诗经》之后《楚辞》的出现，使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跨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里高度赞颂道：

① 凡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
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楚辞》产生百多年后，“汉武好《骚》，淮南作《传》”。自从刘安对屈原代表作《离骚》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进行深入的探索，作出精要概述，开一代风气之后，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对楚辞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遂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楚辞学。

自西汉开始，楚辞学研究就进入了百家争鸣的状态，学者们各抒己见，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引刘安《离骚传》云：

②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

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刘安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高度的评价，是我们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文字记录。但刘安是否就是最早研究楚辞的学者呢？从王逸《离骚》篇后序看，恐怕并不如此：

② 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谗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懣，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

王逸的这段叙述，高度概括了楚辞的流传情况，当时楚辞被当作教科书一样“以相教传”。一般而言，这种教传不会仅仅是表层的文字教读，其间总是要涉及字词的训释、章句的阐述等。汉武帝令刘安作传，刘安竟然“旦受诏，日食时上”。倘使事先不接触有关注本，临时为《离骚》作传，恐怕旦日间是无法交卷的。当然，从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刘安无疑是楚辞学史上第一位辑注家、评论家。辑注的内涵已无法了然，但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还能见到一麟半爪，从思维的角度看具有开拓意义；与《诗经》作比较，认为《离骚》兼有“风”、“雅”的特色。

④ 刘安以后百余年，为《离骚》作传的还有班固、贾逵等，王逸云：

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

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

可见两家注本无论是字义训释，还是内容概括，均存在着差异，且很多篇章“阙而不说”。但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态度则是鲜明的，其思维与刘安是逆向的，他在《离骚序》里道：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⑤

3

从思维的角度考察，班固驳斥刘安的观点，是运用逆向思维。在班固的思维中，屈原及其作品是不合经义的，思维的视点与刘安不同，结论也就大相径庭。

自刘安至班固是楚辞研究的初始阶段，给后人留下的文字寥寥无几，因此无法全面、深入了解他们楚辞研究的思想成果和思维特色。在楚辞学史上真正以新思维研究楚辞，并取得实质性成果，开一代研究之风的当首推东汉王逸。

自西汉至20世纪的两千余年间，楚辞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其特点因为“一时代中或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萌蘖，则举其重者也”^{〔1〕}。第一阶段：西汉至北宋是开创发展期，因受以经学为主导之观念的影响，研究停留在章句训释层面。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是楚辞研究史

（开创“发展”）

〔1〕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见《饮冰室文集·学术》（上），广智书局1904年版。

上第一块里程碑，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则集其大成。这一时期的研究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详于训诂，未得意旨”，虽在解题释义方面作了一定研究，但毕竟是初始阶段，思维未能跳出训诂的框架，往往“未得意旨”。第二阶段：南宋至清末是崛起繁荣期，因受以理学为主导之观念的影响，研究基本上停留在义理探求层面。朱熹《楚辞集注》，是楚辞研究史上的又一块里程碑。^⑥朱熹在王逸“讽谏说”的基础上，把“爱国”的命题第一次明确地引入楚辞研究。另外，朱熹冲破经学家的偏见，在楚辞研究中强调教化意义的同时，提倡自然之美，把屈原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结合起来，提出“文从道中流出”的理论，大大地拓展了楚辞研究的思维空间。

朱熹是义理派的代表人物，是抗金派，他的《楚辞集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竭力颂扬屈原的“忠君爱国之诚心”，矛头是针对当时南宋朝廷中的投降派的。这种思维方式影响所及最明显的是王夫之，他的《楚辞通释》也是义理派的代表作，寄寓自己对明朝故国的哀思，歌颂屈原的爱国思想，意在抒发胸臆。此外，如钱澄之的《屈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也是借注屈原寄托自己对故明的思念。李陈玉的《楚辞笺注》，则是寄寓自己家国之痛。另外一种情况是以注楚辞来辩冤的，最典型的要算是明黄文焕。崇祯年间，其师受冤被捕入狱，黄文焕因受牵连下狱。他有感于朱熹“因受伪学之斥，始注《离骚》”，而自己也因其师被斥为“伪学”而受株连入狱，故作《楚辞听直》，为其师黄道周及自己鸣冤。朱熹以后学者阐发义理各具千秋，乃至“言人人殊”，如汪瑗《楚辞集解》、赵南星《离骚经订注》、林云铭《楚辞灯》、王邦采《楚辞汇订》、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朱骏声《离骚补注》、胡文英《屈骚指掌》、刘梦鹏《屈子章句》、龚景翰《离骚笺》、

陈本礼《屈辞精义》、王闾运《楚辞释》、马其昶《屈赋微》等等。宽泛而言，清代更是楚辞研究方法的变革和范围的拓展，并由传统楚辞学向新楚辞学过渡的时期。朱冀、钱澄之、蒋骥、鲁笔等已从心理学、社会政治学、地理学、文艺学等多方面探讨。还有胡文英将作品研究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两涉楚南，三留楚北，询之耆宿”，继蒋骥后对山川地理详尽考辨，打破了旧的思维惯性，实为综合研究的萌芽。第三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近代是承上启下的转型期。⁽¹⁾这时西学东渐，中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给学术方法和学术价值带来了一次革命。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时期（1898—1905），王国维是整体方法论研究新思维的实践者和推行者，具有20世纪鲜明的时代特征，首先利用安阳小屯村发掘出土不久的殷商卜辞材料予以参照，“二重证据法”打破传统的僵化了的单一典籍治学的思维模式，解读了《天问》“简狄在台”以下28句殷商历史，“该秉继德”的破密是楚辞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新星⁽²⁾，其方法论对闻一多、姜亮夫、汤炳正等学者有着深刻的影响。王国维在1906年发表的《屈子文学之精神》，提出了南北文化融合促成了楚辞文学形成的新思维，所谓“大诗人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像合而为一……斯即屈子之其人也”，把楚辞研究的思考空间大大地加以拓宽。刘师培更从地理环境、社会习惯、风土民情等多种要素出发，指明楚辞属于南方文学，有别于北方文学，但又继承了北方文化，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在“隐括众体”的基础上独创

〔1〕 近代一般指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即1840—1919年，而学术思想的年限就不可能如此清晰。

〔2〕 清刘梦鹏《屈子章句》依据《竹书纪年》、《山海经》、《左传》指出“该”即殷人先祖“王亥”，“有扈”为“有易”之误，王国维则用甲骨卜辞实物证明“该”即“王亥”。

新体,纠正了楚辞一个源头说的偏见。早在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已经论及屈原的情感世界、学术思想及其作品,为日后的《屈原研究》等奠定了基础。

概而言之,在楚辞学研究史上,“五四”新文化以前的近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是从基本上单一研究模式转为全方位、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模式的历史性转轨,是从传统楚辞学到新楚辞学的嬗变。

严格说来,近代楚辞研究也还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的桎梏,楚辞学的主流仍然滞留在狭义的文献考据学的框架内,没有从“经学”里剥离出来,学者大多为晚清名士朝臣。他们有感于列强肆虐、清廷羸弱,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欲借楚辞寄寓“存君兴国之念”,马其昶的《屈赋微》可为代表。直至“五四”后的1922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文哲会讲演《屈原研究》,1923年著《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才将楚辞从经义中解放出来,开启现当代楚辞研究的新风,以西方哲人的观点研究屈原及其作品,其研究方法和价值判断始具时代风尚和世界特点。梁启超拓展了学术研究的思维空间,从纯文学及其历史发展的角度去把握楚辞,初步预示现代《楚辞》综合研究的前景,在楚辞学史上发生了质的飞跃,成为游国恩、闻一多、支伟成一些学者的先导。尔后楚辞研究的主流逐渐向全方位、综合性的方向推进,涉及的问题愈来愈广泛,研究的视角愈来愈新颖。换言之,进入后“五四”时代,楚辞研究呈现出了新时代的特色。游国恩《楚辞概论》把楚辞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放在历史的纵面和社会的横面两个坐标上作综合研究,发扬了

〔1〕作者原拟分十六章,仅大体完成了第一至第六,及第八章,前六章发在1902年《新民丛报》。

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可算是有《楚辞》以来的一部空前的著作”〔1〕，为楚辞学史上新的里程碑，是第四个阶段的开始。游国恩的《读骚论微初集》体现了在宏观指导下的微观研究新思维，该研究是“五四”以后方法论的创新，积极地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完整的楚辞学体系。从20世纪楚辞学史的角度审视，游国恩无愧为新楚辞学的奠基人，而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陆侃如、谢无量等则为新楚辞学的奠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郭沫若利用甲骨卜辞来研究楚辞，不过，郭沫若的主要贡献在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古代历史，解读楚辞。他把楚辞放在当时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背景中加以分析研究，角度新、观点新，多有发明。闻一多研究楚辞先给自己规定“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三项课题，采用传统和现代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新思维，继王国维用实证考释楚辞，《楚辞校补》开其首〔2〕，获得了丰硕成果。姜亮夫承先师王国维倡导的“类比法”，在楚辞研究上采用“个别分析，综合整理”的新思路。他的《屈原赋校注》是最早的学术实践，用此法治屈赋确为楚辞研究的一大特色，不失为一种创新思维。“五四”以后李翘《屈宋方言考》、支伟成《楚辞之研究》、饶宗颐《楚辞地理考》等都渗透着创新意识，在20世纪楚辞学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五四”以后楚辞学界曾刮起一股“疑古”之风，把楚辞说成是秦博士为始皇作的仙真人诗，从而否定屈原《离骚》等著作权，这就不能以新思维视之。始作俑者为今文经学家廖季平，作《楚辞新解》和《楚辞讲义》否定屈原及其作品，胡适、卫聚贤、丁迪豪随其后，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则将“疑

〔1〕 陆侃如：《楚辞概论序》。

〔2〕 刘师培《楚辞考异》对闻一多《楚辞校补》产生一定的影响。

古”之风发展到了极端。当然,廖季平等人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学术界的批评,谢无量《楚辞新论》、陆侃如《读〈读楚辞〉》、郭沫若《屈原研究》等早就对他们进行批驳。值得指出的是,《楚辞新论》在批判否定论的同时,已经开始构建新的楚辞学,以全新的思维全面认识屈原及其作品的特点。尔后,否定论渐渐地销声匿迹。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已没有什么大的市场^[1],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三泽玲尔、白川静、冈村繁等重弹否定屈原的老调^[2],楚辞学界才又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在“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汤炳正的努力下,召开了“屈原问题讨论会”,并亲自撰写《〈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率先用事实驳斥“否定论”。黄中模《现代楚辞批评史》则是对“屈原否定论”的全面、系统的清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楚辞研究跃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1953年,屈原被国际和平理事会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加以隆重纪念后^[3],学习和研究屈原及其作品呈现出了空前的热潮,为建国后第一个高峰。学术界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重新审视和总结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大力普及和宣传。郭沫若《屈原赋今译》,文怀沙《屈原离骚今绎》、《屈原九歌今绎》、《屈原九章今绎》、《屈原招魂今绎》,游国恩《屈原》,瞿蜕园《楚辞今读》,陆侃如、高亨、黄孝纾《楚辞选》,马茂元《楚辞选》,詹安泰《屈原》,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逯钦立《屈原离骚简论》,张纵逸《屈原与楚辞》,郭维森《屈原与楚辞》等,以及大量论文如雨

〔1〕 1951年朱东润曾在《光明日报》发表4篇文章,否定屈原著作权,认为楚辞是淮南王刘安所作,文章刊出后就受到郭沫若、宋云彬的批驳。

〔2〕 20世纪60年代也有日本学者否定屈原及其作品,如铃木修次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但论点、论据不过是廖季平、何天行等人的翻版。

〔3〕 1953年,纪念的四大世界名人是:屈原、哥白尼、拉布雷、何塞·马蒂。

后春笋般涌现。不过,这些论著大多带着浓厚的时代烙印,体现所谓“古为今用”的原则,缺乏创新意识、独立意识,王国维早就说过:“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1]这一时期楚辞研究的总体思维定格在屈原作品的人民性、爱国主义和法治思想框架中,郭沫若、李长之、游国恩、郑振铎、林庚、陆侃如、俞平伯、孙作云、浦江清、李嘉言、王瑶、李一氓等专家学者纷纷撰文,不少论文将屈原作品的历史价值不适当地拔高,政治色彩超越学术研究,使楚辞研究偏离了主航道。尤其是屈原的法治思想(按:屈原确实有法治观念),在1974年的“文革”期间,再度成为热点,屈原被抬上了“法家”的位置,变成“尊法批儒”的英雄,冠以“法家诗人”的头衔,做了“评法批儒”的附庸,这就更谈不上“创新”了。正是由于楚辞研究受政治的影响,建国后对过去的传统研究方式展开了超越学术范围的批判,动辄套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繁琐哲学”等帽子,是楚辞研究中的一股浊流。平心而论,对于楚辞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解读,本来没有什么好指责的,问题是“文革”前左的思想干扰了楚辞研究,必然导致其成为极左思想的婢女。孙作云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文艺批评两个标准引入楚辞研究领域,算不了是新思维。当然,话也要说回来,其间也不乏采用新方法、新思维进行研究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如郭沫若、浦江青用岁星纪年法,根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推算出屈原的生辰。更有朱季海《楚辞解故》、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沈祖

[1]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之《静安文集》第97页。

繇《屈原赋证辨》、汤炳正《楚辞类稿》^{〔1〕}、王泗原《离骚语文疏解》等,为楚辞学研究增光添彩,绽放开一朵朵创新之花!

总的说来,从建国至“文革”,楚辞研究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大多属训释、义理探求层面,未有整体研究的突破;虽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研究,但往往打上政治烙印,偏离学术航向;一些纯正的学术著作又重返训诂、义理传统层面研究。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由于政治误导,学术研究变成了政治的宣传品。

“文革”十年是20世纪楚辞研究的最低谷,几乎一片空白。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送给他一部朱熹《楚辞集注》,也未能打破沉寂。“文革”以后的二十余年,是楚辞研究史上最繁荣、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辉煌时期,为建国后楚辞研究的第二个高峰。特别是自1985年在湖北江陵成立了中国屈原学会以后,每隔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把楚辞研究推向了世纪顶峰。研究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研究方法之新,学术成果之丰,发展速度之快,是两千多年来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是创新,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作为学术研究,创新也是进步的灵魂,是楚辞研究持续发展的源头活水,而方法的创新是关键。这一时期强调文学本体的内在深层探索和文学系统的多边协作研究;追求文理打通,中西结合;宏观与微观一体,分析与综合统一,把楚辞放在世界文化大背景中展开探讨,呈现出新方法蜂起更迭、新思维汹涌澎湃的多元局面。站在21世纪初回眸这一历史奇景,令人感叹楚辞这门显学的内在伟力和新时期楚辞学研究更加广阔、更为全面的学术思想视野。

〔1〕《楚辞类稿》,首版于1988年,但175题的研究成果都是建国前后的积累。